

历史 镜像

—— 社会变迁与近代中国女性生活

王晓丹 著




以女性视觉为切入点，对近代女性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婚姻家庭、文化教育、审美习俗和消闲娱乐生活进行探讨和描述，展示社会近代化过程中，中国女性生活的多维图景。同时，进一步探讨女性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

历史镜像

——社会变迁与近代中国女性生活

王晓丹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镜像：社会变迁与近代中国女性生活/王晓丹
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 - 7 - 5482 - 0584 - 5

I. ①历… II. ①王… III. ①女性—社会生活—研究
—中国—近代 IV. ①D693. 9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3078 号

历史镜像

——社会变迁与近代中国女性生活

王晓丹 著

策划编辑：徐 曼
责任编辑：王 磊
封面设计：夏雪梅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云南科技印刷厂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8
字 数：207 千
版 次：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82 - 0584 - 5
定 价：22.00 元

地 址：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邮编：650091）
发行电话：0871 - 5031071 5033244
网 址：<http://www.ynup.com>
E - mail：market@ynup.com

序 言

女性的地位及其生活状态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它从一个侧面向人们揭示出社会生活的多维图景。以往的女性史的研究，大都偏重于对女性解放、妇女运动或特殊女性人物史的研究，伴随着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日益深入，女性史研究已不仅仅局限于上述领域，而开始涉及广大妇女的经济生活、文化教育、婚姻家庭、风俗习惯以及日常生活领域等方面。人们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指导下，吸取了西方新史学、后现代主义等不同学派和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目光聚焦于全体女性，在继续研究知名女性和上层女性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城市和乡村普通女性的研究，并从孤立地考察女性状况，或者简单地把女性的历史活动填入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历史中的做法发展到结合男性生存状况和从两性中立关系来进行的社会性别史研究。这大大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丰富了史学的内容，也为历史研究增添了新的视角。

我对近代女性史的研究源于2006年，当时在复旦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导师陈雁的指导下，系统地学习了社会性别史的相关

理论和各方面的议题，以及新的研究方法以及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范例，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和书籍，拓展和加深了我对社会性别史的理解与认识，为后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7年，我在曲靖师范学院开设了《女性学》的选修课，并撰写了关于《女性学》课程建设的论文，受到同学们的广泛欢迎。在此基础上，我主持完成了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近代中国妇女地位嬗变研究》。此项目从史学、社会学和女性文化的视角，对近代妇女的主体意识、参政权利、文化教育、职业发展、婚姻生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女性史打下了基础。

本书的来源是我这几年来学习和研究所积累的心得。它是在前人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收集和掌握的文献资料进行认真分析和研究写成的。本书在理论方法上，采用社会学上关于“角色”划分和社会分层的理论和方法，注重把观念史和社会史相结合，把社会生活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通过对概念和社会实际互动关系的分析，探索概念和社会生活的对流、制约和磨合，揭示具体的社会问题。同时，运用纵向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女性视觉为切入点，对近代女性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婚姻家庭、文化教育、审美习俗和休闲娱乐生活进行了探讨和描述，以展示社会近代化过程中中国女性生活的立体画面。同时，进一步探讨女性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女性社会生活的转变，在事实上突破了传统女性“居内不出”、“惟酒食是议”的闺阁训条，也对“男女授受不亲”的性别隔离制度形成挑战。走出家门，

步入社会，使得她们有机会亲身感知家门以外社会的变迁，在更广阔的环境中去感悟自身与社会的关联，初步具有近代性别意识的价值观念，成为推动性别文化转型的鲜活载体。进一步为社会诠释男女平等的新观念，“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遭到了唾弃；传统的审美观受到了冲击；“男主外，女主内”的思维模式得到了改变；“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思想受到了挑战。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人格独立，自尊、自立等新思想和新观念。观念的转变又引起人们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更新和社会习俗的改变，促进了人的近代化和社会的发展。

当然，《历史镜像——社会变迁与近代中国女性生活》无论在选题上，还是在成果上，对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领域来说，都还是基础性的，稚嫩和舛错在所难免，还有待以后深入研究和进一步拓展来加以丰富和完善。

王晓丹

2011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转换与重构:近代中国女性社会角色的变迁	(1)
第一节 传统社会女性社会角色回溯	(1)
第二节 近代女性社会角色变迁的社会基础	(7)
第三节 近代女性社会角色的变迁与社会发展	(14)
第二章 美丽的嬗变:女性美与近代审美习俗	(21)
第一节 中国传统女性美的演变	(21)
第二节 缠足习俗与审美	(28)
第三节 放足运动与女性生活	(37)
第四节 身体规训与审美	(52)
第三章 启蒙与觉醒:中国近代女性教育	(60)
第一节 传统教育与女性教育	(60)
第二节 中国近代女学的兴起	(61)
第三节 教育平权和男女同校	(70)
第四节 中国女留学生教育	(77)
第四章 围城内外:近代中国的婚姻家庭与妇女生活	(95)
第一节 中国传统婚姻习俗	(95)
第二节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女性婚恋观的变迁	(104)

第三节	离婚与再婚	(124)
第五章	独立与自立:中国近代女性就业之路	(139)
第一节	传统社会中的女性职业	(139)
第二节	中国近代女性就业的兴起与发展	(143)
第三节	女性就业的影响	(161)
第四节	女教师	(165)
第六章	解放与自我解放:近代女性的政治参与	(177)
第一节	女性政治参与思想的萌芽和意愿	(177)
第二节	近代女性参政实践的轨迹	(182)
第三节	近代女性的民族民主运动	(192)
第七章	趋新与文明:近代都市女性的消闲娱乐生活	(201)
第一节	传统社会女性的消闲娱乐生活	(201)
第二节	都市女性消闲娱乐生活的变化	(210)
第三节	消闲娱乐与女性意识	(221)
第四节	女性消闲娱乐的社会意义	(222)
参考资料	(238)

第一章 转换与重构：近代中国女性社会角色的变迁

社会角色是与人的社会地位相一致的一整套行为模式。它是社会对于处在某种特定社会地位的人们行为期待，是构成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的基础。在社会生活中，个人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并以一定的社会成员的身份与他人进行交往。社会身份表明了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和社会对他的期望所形成的一种社会行为模式。这种在一定的社会位置上的行为模式，就是社会角色。社会角色规定了个人的角色行为，人们必须各自按照明文规定的或者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规定和生活。社会角色是社会的“晴雨表”，它反映社会结构的诸多特征。女性社会角色的变迁可谓是社会转型的指针，标志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多方面的变动，实质上是女性个人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变化的动态表现。

第一节 传统社会女性社会角色回溯

人类学家证实，在人类进入定居的农耕生活方式前，妇女在经济和社会上有着强有力的地位，她们曾经主宰着生活，有着漫长的光荣历史。在中国，“女娲时代”就是人类妇女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女娲的神话始见于《楚辞·天问》、《山海经·大荒西经》。女娲最早出现的面目是“化生”，据《山海经·大荒西

经》记载：“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粟广之野，横道而处。”王逸注释时也说女娲“一日七十化”。“化”就是变，蕴涵着生育主题。《说文》：“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在神话中，女娲是化育万物的女神，自然也是创造人类的女神。《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通》：“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此外，女娲还是一位“炼石补天”的英雄，女娲补天的神话塑造了一个万人敬仰的伟大女神形象。《淮南子·览冥训》说，女娲以其生命的全部，重新安定了天地，使人类再度获得生息繁衍的权利。神话以转喻的形式叙述了远古时期相继发生的历史事件，女娲神话所处的时代，人类学家称为母系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①。妇女是这个时代的主人，女性是“第一性”的。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妇女的光荣史开始渐行渐远。大约在五千年前，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男子的作用不断加强，逐渐代替了妇女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这种变化最早体现为一夫一妻制的出现。由于定居生活稳固、经济单位缩小、家庭形式完备这些标志着社会进步的情况的出现，最早的一夫一妻关系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男子要求女子遵守贞操，以便生子继承其私有财产，此时，由不固定的对偶婚制转化为较固定的一夫一妻制的条件已完全成熟。一夫一妻制的确立是男性获得支配权的标志。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

^①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1页。

时发生的。”^①正是这种男女关系的改变，社会才有了对女子贞节等的要求与限制，女子也有了取悦于人的和依附于人的生活方式。

不过，由于历史的积淀，母系社会的遗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有所留存。这一点从中国传说及古籍中夏、商、周的女性称谓中可以看出，如夏有女娇、女歧，商有简狄、妲己，周有姜原、褒姒，等等。称谓是个人在社会中的区别符号，它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的社会地位及社会性质。透过中国古代对女性称谓的结构组合模式及其演变，我们可以窥见其中所蕴涵的历史文化意义，在这些称谓中，女性都有自己的私名。女性私名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纯私名”式，女性的名字就用一个字表示，可以独立的标明自我；第二种是“前附+私名”式，即在私名前附上氏族徽号、庙号、亲属关系等字来指称，但其核心元素是私名用字。当封建礼教风气日重，女性就只能用“张李氏”来指称了。所以，女性私名的存在寓示着女性在历史的某一时刻有着自我独立的人格，“殷代女性私名用字具有独立性，这种殷代女性称谓的模式显示出某些母权社会的遗风”^②。

事实上，在中国商代，平民妇女和贵族妇女的社会地位都还没有降到周代以后那样卑下的地步，妇女在某种程度上在社会事务中还起着很大的作用。商代妇女有一定的财富，独立经营田产。她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还起重要作用，武丁、康丁两世，有妇女充当小臣（商代的臣正），妇女还参与祭礼、占卜，做巫祝。贵族妇女更是广泛地参加国家政治活动，在国家政权机构中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转引自樊静《中国婚姻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② 曹兆兰：《金文与殷周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占有一定的地位。商代有很多有名的女子，她们作出了非凡的事迹。比如商代的妇好，是武丁的王后，本领很大，既能主持宗庙祭祀，又能领兵打仗。在武丁对周围二十多个“国家”的战争中，她经常统兵率将、驰骋疆场，屡立战功。而周代根本就不准许女人接触军事，从商代到周代，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开始下降。

到了周代，礼教严格，男女界限分明，《周易·系辞下》云：“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乾道成阳，坤道成阴。”《周礼·冬官考工记》云：“阳也者，缜理而坚；阴也者，疏理而柔。”由此便慢慢形成了一整套天地阴阳观念：天道为乾，地道为坤；乾为阳，坤为阴；阳成男，阴成女；阳尊阴卑，阳刚阴柔；男人处于主宰领导地位，女子处于被动依附地位。在传统的家庭关系、婚姻关系中，男人始终处于主动的、尊贵的地位，女人始终处于被动的、卑贱的地位。在社会分工上，也主张男女有别，形成固定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两性分工的制度从周代第一次用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开始确立了男子从事包括“惟祀与戎”的“国之大事”、从事外交的政事、籍田以劝农桑的农事——这些领域被视为公事和外事；而妇女仅仅被限定在从事内事和私事——家中馈和务蚕织^①。

《礼记·内则》对男女“内外”分工作规定：“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外内不共井，不共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

^① 杜芳琴：《华夏性别制度的形成及特点》，载金一虹、刘伯红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与发展——理论·经济·文化与健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页。

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寝门之内，妇人治其业焉”^①，女性的活动范围被严格地限制在家庭范围之内，“唯酒食是议”^②。可见，男女的内外分工模式，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活动空间的划分，女性以家内空间为主，男性以家庭外的活动空间为主；二是所从事的事务的划分，女性从事家务为主，男性以参与家外的社会事务为主。因为女性的一生为人女、为人妇、为人妻，所从事的主要活动是主中馈、奉祭祀、孝舅姑、相夫教子、和族人睦邻里等。“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天地之大义也”^③。民族心理结构中固有的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社会要求男性求取功名、封妻荫子，充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角色；而女性则是相夫教子，以照顾丈夫和养育子女为主要职责，做个贤妻良母是她们一生的追求。女性的家庭角色一直处于她所承担的其他角色之上。由于“男主外，女主内”的男性本位观念，出现了“男耕女织”的分工模式和以性别为出发点的社会分工，因此，在经济活动中，男性垄断主要的生产领域，女性只能从事纺线织布、帮助丈夫料理一些家庭副业和操持家务等家庭内部的劳动，同家庭中的性别角色一样，在职业角色中也存在着性别歧视，女性基本上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和经济来源，被排除在社会公共领域的大门之外，只能成为丈夫和家庭的依附。与性别分工模式相适应的是，女性的活动被限制在家庭范围之内，家庭范围之外的公事、国事是男性的特权。《诗经·大雅·瞻印》中就说：“妇无公事，休其蚕织！”突出表现了对女性参政权的剥夺。“妇人无爵，从夫之爵，

① 薛安勤、王连生：《国语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

② 《诗经·小雅·斯干》。

③ 《易经·家人》。

坐以夫之齿”^①，夫贵才能妻荣。“牝鸡无晨，母鸡之晨，惟家之索”^②。既有雄鸡报晓，母鸡就不应越俎代庖，否则将引起家国没落。女性参政会祸国殃民。因此，在政治权力结构中，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女宰相、女知府、女知县。几千年来仅有几个女性登上了最高统治者的位置，但所占比例甚小，而且，也无不是依仗自己丈夫的特殊地位，然后才有可能在特殊的社会政治条件下登上最高统治者的位置。从吕后到武则天，历史上的女性参政者无不背上千古骂名。妇不参政，因而形成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道德规范，女性的教育权利因而随之剥夺。

中国传统社会还对女性角色规定了极为严格的行为准则，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夫唱妇随”、“父严母慈”等，尤其是“三从四德”的礼教规范，对女性的言谈、举止、服饰、容貌和思想观念进行了全面而严格的规定，“三从”出自《礼记·郊特牲》：“出乎大门而先男率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从父”表现为由父亲决定女儿的婚嫁事宜，女儿没有选择终身伴侣的自由。“从夫”是通过婚姻使女性从父亲的控制转移到丈夫的控制中。“从子”则是表明性别秩序先于严格的长幼辈分。“四德”出自《周礼·天官·九嫔》，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妇德”就是守节操，从一而终。“妇言”要求女性语言得体，讲话有分寸。“妇容”对女性的容貌提出了要求，“女为悦己者容”，要求女性端庄娴雅，符合传统社会的审美要求并取悦于丈夫。“妇功”指劳动，比如纺纱、织布、缝纫、刺绣，做饭、操持家务等，女性必须并且也只能在这些方面显示自己的心灵手巧。这些由社会对女性所规定的行为规范，个人和家庭都无

① 《礼记·郊特牲》。

② 《尚书·牧誓》。

法超越。

综上所述，传统社会的女性性别角色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父权制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而这种性别建构对两性来说是不平等的。在传统社会中，女性角色成为男性角色的从属物，她们缺乏独立的人格、自主的行为、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经济能力和活动的公共空间。

第二节 近代女性社会角色 变迁的社会基础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发生千年巨变。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深入，中国传统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贸易方式发生了变革。近代市场开始由沿海向内地不断扩展，工业化进程渐趋推进，对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导致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整个近代社会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旧的社会结构趋于没落和瓦解，新结构开始诞生和成长，社会内部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代女性社会角色的变化就是伴随这一社会转型而产生和发展的。

一、近代社会经济转型是女性社会角色变迁的物质基础

19世纪后期，随着新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近代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洪流中，中国社会逐步显露出向现代社会发展和转化的征兆。经济率先作为突破口，打开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大门。

近代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城市化的出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导致了耕与织的分离、部分农产品商品化，出现资本主义商业以及中国本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快速增长。经济

结构的转型使中国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遭到了破坏，许多依靠纺织维持生活的妇女失去了生计，为了生存，她们被迫进入工厂出卖劳动力。于是，纱厂、丝厂、火柴厂成了女工的集中地。经济结构的转型为广大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提供了契机。中国社会破天荒地涌现了一批走出家庭的从事社会生产的职业女性。这里的职业女性是相对于传统的家庭主妇而言的，她们走出家庭，身兼家庭、社会两重角色，有自己的独立经济收入。职业女性的出现，突破了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不仅使女性能力、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而且为女性独立奠定了基础。女性就业经历了小范围、小规模就业到广泛就业的过程，所从事的职业也从类型单一发展到广泛参与社会领域各个行业，同时也经历了从事实就业到法律上确认与男子平等就业权的过程。近代最早出现的新型职业女性是工厂女工。产业女工最早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据统计，甲午战争前，女工人数在35 000人左右，约占工人总数的35%；1915年，全国工人总数为643 524人，其中女工为245 026人^①。均占了三分之一以上。产业女工大都来自破产的农民和城市下层的妇女。产业女工是中国近代最早从单一家庭角色进入双重角色的女性群体。虽然她们还必须承担着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但是已成为新兴的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她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出了家庭的狭小天地，社会化生产取代了家庭为单位的分散活动，她们的生活方式逐渐融入社会化的生活方式中。

经济转型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城市化的出现，它是经济结构变化的伴生物。中国传统城市结构模式的变化发生在1840年以后，首先是通商口岸的开辟，使部分城市迅速成为中外贸易的枢纽和

^① 王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35页。

集散地。其次是随着工厂企业的建立发展，出现了一批因工而兴、因矿而兴、因路而兴的城市。城市内部的组织与功能较之传统城市有较大变化，一些新的经济组织（如银行、工厂、轮船公司）和文化以及文化教育组织（如报刊、学校、出版单位、新闻单位等）先后出现，城市便逐渐成为了人口的集聚地和经济文化教育中心，从而为人们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职业和选择机会。所以城市不但存在着大量的女工，而且还出现了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妇女，包括幼儿园、大中小学的教师、图书馆职员、医生、护士、编辑、记者、翻译、会计师、银行公司职员、机关工作人员等。同时也出现为商界服务的妇女，包括打字、速记、管理、电话邮政服务人员以及手工业者和女佣。

五四时期，经济独立被视为妇女解放的关键所在，女性职业权受到更多关注和社会认同。经过广大妇女的努力和争取，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明确规定“各机关宜一律为妇女开放”，并于同年6月正式实施，女性职业权得到了法律认可^①。女性职业之门的打开，使妇女进入另一崭新的天地，其角色由家庭逐渐向社会转变。女性通过职业的途径，从以前的家庭角色进入社会公共领域，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身份，也拥有了更多的对社会资源占有和支配的权力，增强了女性的独立意识，冲击了社会性别差异的观念，同时也拓展了女性群体生存的新空间，为女性自身的解放与发展开辟了道路。有了经济上的自立，女性才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和决定生活方式的可能。

^① 杜芳琴、王政主编：《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7页。